

## 前言

杰鲁莎·麦克考迈克

戴从容 译

自中爱关系第一本论文集《爱尔兰人与中国》出版 10 年来，爱尔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爱尔兰虽然按惯例被定义为小型开放经济体，现在却正成为日益全球化的开放文化体。在过去十年中，在纪念 1916 年复活节起义这一建国性事件之际，定义谁是爱尔兰人现在无疑应将大约 200 个民族都包括进来。这个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曾对它移居国外的孩子们说再见，现在正欢迎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移民，包括中国人。正如本书中的一篇文章指出的，根据 2011 年人口统计，爱尔兰的中国移民较 2002 年增长了 91%。从更长时段看，才半个多世纪，爱尔兰的中国人就从一个基本上“隐身”的小群体，变成爱尔兰非欧盟人口中的第五大群体。

与此相应，如今许多爱尔兰人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家。近几年，在向人数更多的中国公众介绍爱尔兰方面，可以说商人显然遥遥领先抓住了先机。因此中国的消费者（就如一篇文章指出的）如今可以在他们更大的超市里，每天买到诸如爱尔兰婴儿配方奶粉、金凯利黄油，百利爱尔兰奶油酒和尊美纯威士忌等酒精饮料——以及甚至更近期，爱尔兰牛肉和羊肉。但是或许更名副其实的是，许多中国人早就通过爱尔兰文化——由爱尔兰文学和爱尔兰舞蹈代表——发现了爱尔兰。至今近一个世纪以来，就像一篇研究中国兴起的爱尔兰研究的文章指出的，中国读者早就有机会熟悉萧伯纳、叶芝和王尔德这样的人。过去几十年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翻译的推动下，对爱尔兰作品的渴求仍在增长。用独特的爱尔兰方式讲述的爱尔兰故事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为从新的视角思考今天爱尔兰性意味着什么打开了大门。

这些视角或许可以用对《大河舞》的反响做最好的概括——这出舞剧 2019 年再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演，庆祝它的 20 岁。作为编辑，我很吃惊两篇互不相干的文章的中国作者——一篇出自《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译者，另一篇论《大河舞》的文章出自民族音乐专业的两位研究生——在爱尔兰对他们以及对对中国读者观众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就像《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译者戴从容描述的，她

一开始迷上乔伊斯，是因为她感到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爱尔兰的“心灵”——爱尔兰人或许称为“灵魂”——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情感智慧。在读了——然后翻译了——乔伊斯之后，戴从容承认她从乔伊斯那里学到的，是用“拥抱这个备受困扰的世界的博大胸怀”来写作。通过乔伊斯的作品，她找到了对其他人的新的恻隐之心，她称之为“同情”，或者更简单地，“爱”。然而她也承认，“这样的心胸不可能出现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她发现，其中的排斥异己与她在乔伊斯作品中发现的那种包容格格不入——即，拥抱差异，从而拥抱一种新的自由。

在将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称为“自由之书”的时候，戴从容同样注意到两位论《大河舞》的中国作者最推崇的品质之一。两人详细描述了他们从加入舞蹈动作的观众身上看到的新的自由——通过跺脚、拍手，甚至在过道上欢呼或跳舞获得的。这种自由，就像戴从容对乔伊斯的解读，是通过把观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向他们伸出手拥抱他们。正如他们注意到的，正是这一特殊的活力让《大河舞》容纳了截然不同的因素，比如西班牙的弗拉门戈舞或俄罗斯斯拉夫舞蹈——可以说一拍不顿。这是怎么做到的？两位作者说，“《大河舞》力求触及各行各业的人们”。或者用谢默斯·希尼（爱尔兰最近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话说，它的艺术让我们参加进来，激发了那些将我们连入“人链”的仪式。这是一种爱尔兰的团结观念，郭沫若那句被用作本书题词的话是其凝炼：“可爱的爱尔兰的儿童呀！/自由之神终会要加护你们，/因为你们能自相加护……”

总之，这里的很多文章证实的是爱尔兰文化改变中国读者的方式——无论是藉由200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媒体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还是藉由对爱尔兰事件或作品的翻译。生活在一个阶层界限分明的社会里，这些爱尔兰的介入因素对中国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让他们想到与爱尔兰人一样，他们也生活在一个共和国：一个建立在国家属于所有“人民”这一信念之上的国家？它们还唤醒了其他哪些与爱尔兰类似的地方？爱尔兰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经历了从帝国，到被殖民、现代化，到如今作为当代有影响力的富强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国对爱尔兰经验的热情接纳显示了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影响下的非凡改变——这个改变对双方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相互交往至关重要。

审视爱尔兰因素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其他影响，共和政体上的相通性似乎在它们建国前的政治热情中表达得最充分。郭沫若的革命诗歌《胜利的死》抓住了这样一个

时刻，该诗写于 1920 年代后期爱尔兰共和主义者特伦斯·麦克斯威尼漫长的绝食斗争之际。阅读此诗，在大步迈向跨语言、跨民族的休戚与共中，两个新生民族之间各式各样文化差异似乎被搁置到了一边，正如在两个国家中，文学革命都预兆着现实革命。然而，就像书中很多文章表明的，事实上，这类改变不但仍在发生，而且相互影响。那些在爱尔兰已经被改变并彻底改变了的，会通过它所改变了的转而再带来改变。完全可以说，将来，中国通过乔伊斯的作品或者《大河舞》的表演所构造的爱尔兰，可能成为爱尔兰理解自身的关键：因为它提出了一种公开平等、包容却多样、创新却依然与自己的传统保持联系的爱尔兰蓝图。对我们这些生活其间的人来说，它提供了爱尔兰在最好的情况下将向着希望变成的样子演进的情景：在这个蓝图里我们将发现更真实的自己——也更陌生。

从另一个方面看，有必要记住中国人移居爱尔兰的时候，如何也改变着我们对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不仅与外部世界，而且与宇宙本身。江涛教授移居爱尔兰，作为天文学家在丹辛克天文台工作了几十年，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一种典型模式，他的作品在纪念他生平的文章中有详细介绍。江涛熟悉中国古代文献，他不仅帮助开启了中爱之间弥足珍贵的专业联系，而且用他自己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知识，完善了西方对，比如，哈雷彗星的轨道的认识，以及哈雷轨道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江涛对更大图景的关心在约瑟夫·格兰奇的文章中得到呼应，并由格兰奇以前的学生吉姆·贝胡尼阿克做了修订，该文论述了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之一道教，与可以说爱尔兰最伟大的思想家约翰·斯科特斯·厄里根纳在哲学观念上的相似之处。另一篇文章记录了至今依然不为人知的中国植物移植到爱尔兰的过程，由此改变了我们的景观。此外，先移居韩国，然后移居中国的圣高隆庞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休·麦克马洪呈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发现如何深化了他自己对爱尔兰日益变化的社会的看法：他发现他在中国工作时感受到的谦虚、变通和人际关系，在爱尔兰传统中受到同样的重视。

换位——一个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性的与他者交往——不可避免地带来改变。以本书为例，10 年前编辑《中国与爱尔兰》的第一版时，我找不到什么中国作者可以为该册撰稿。这一次，很容易就找到 4 位——甚至发现了更多。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爱尔兰，其中不少人可谓耳熟能详。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如何被这一重新定位所动摇或改变，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取决于他们的出生地、教育和社会阶层。但是正如爱尔兰公民拒绝被混为一谈、千人一面（通常是模式化思

维的结果），我们的新华裔公民也是如此，他们完全有理由反对被简单定义为“中国人”——尤其如今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实际出生于爱尔兰。谈到同一问题的另一面，一位既是生态顾问，现在也在爱尔兰食品局工作的爱尔兰人详细描述了劝说日益增长的中国中产阶级爱尔兰食物“好吃”有多么困难，以及有多少回报。为此他不得不竭力改变那些对环境、环境在食物生产中的作用，以及日常饮食的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的例子揭示了一个人如何既学会尊重不同的行为方式，与此同时又努力改变对我们生活中的最基本需求的看法。

一个人如何横跨差异如此悬殊的世界？每篇文章都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就如智者庄子说的，道行之而成。今天阅读这些文章，看到中爱两国人民精神上的倾心合作开辟了多少这样的新道路，真是令人感动。这一潜含但至关重要的精神合作正不断发展，可以说在道家思想与约翰·斯科特斯·厄里根纳的基督教学说的相通相似中就清晰呈现了。那篇对两者进行比较的文章尤其强调的，是他们都坚信万事万物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联系。更具体地说，几乎本书的每篇文章都印证了这一精神上的合作。比如在爱尔兰的植物采集者奥古斯丁·亨利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他的工作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他那由专业训练的中国植物采集者组成的团队——他在云南省的最大发现归功于一个被友爱地称为“老何”的人。在文化领域，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这样的合作在中国随处可见，这些学者承担起爱尔兰主要作品的翻译工作——以及/或者目前正承担着他们自己高校里涌现的爱尔兰研究。同样让人惊叹的，这里的很多文章都是合力创作的，包括那些前期合作的力度，我作为编辑，离不开其他人来复核论文，以确保精确性和可靠性。事实上，没有我那些中国同事们的信任，他们爽快地发来文章供我编辑——或者没有我的爱尔兰合作者，他们花大量时间辛苦工作，以便对爱尔兰在中国的位置，或者众多中国移民对爱尔兰的贡献，说出他们的准确评判，哪里还会有这本书？

我们未来的道路还很长。爱尔兰和中国都在飞速变化，但无论在理解上，还是通过双方的众多应用机构，双方显然越走越近。本书正是朝着那些方向努力，希望尽管存在着语言上的重重困难，或者尽管地理和文化上都存在着体量和距离的差异，双方都会继续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相互学习，从而继续改变。